

读书札记



《中国人的精神》封面 译林出版社出版

《中国人的精神》译林出版社 2012年8月再版,辜鸿铭作为中国文化巨擘再度引起阅读热度。

其实,早在近一个世纪以前,辜鸿铭就敏锐地发现中华文明、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他在1915年以英文出版的《中国人的精神》中,系统地阐述了这一观点。此后几十年,各种版本的《中国人的精神》中文版不断出版,蔚为壮观。辜氏以旁征博引、汪洋恣肆的笔法,论述中国文化的精神要义,对比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品质差异,在彰显中国传统的独特价值的同时,也揭露了西方文明的深层弊病。辜鸿铭主张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解决西方社会存在的问题并对其进行改造。这对于当时刚刚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败和庚子国难后文化自信心陷入谷底的中国人来说,有着巨大的振奋作用。该书出版后,在西方社会也引起巨大反响,并在一战后的西方世界也掀起对西方文明的反思和检讨。

——读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

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岚桦

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辜鸿铭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中国文明的精义。他认为,中国文明的三个特征就是:精深、博大和淳朴。辜鸿铭对中国文明充满信心。他说:“通过对东西文明的比较研究,我很自然的得出一个重大的结论,那就是,这养育滋润我们的东方文明,即便不优越于西方文明,至少也不比他们低劣……实际上,中日两国的青年都是通过望远镜观察西方文明的,因而使得欧洲的一切都变的比实体伟大、卓越。而他们在观察自身时,却将望远镜倒过来,这当然就把一切都看小了。”这种精妙的比喻是公允而准确的。同时也有极大的启发意义的,这在当时一切向西方看齐的环境下,显得难能可贵。

辜鸿铭在书中还不足对西方文化的批判。他认为,西方文明是一种机械文明。他说:“常有人说,欧洲文明是物质文明,其实欧洲文明是比物质文明还要次一等的机械文明。虽然,罗马时代的文明是物质文明,但现在的欧洲文明则是纯粹的机械文明,而没有精神的东。”他认为西方科技的发展束缚了人自身才能的展现,人与人的关系也很冷漠,缺乏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温情的交流。这些都是西方人自己都坦承的。同时,辜鸿铭认为估价一个文明,不在于有巨大的城市、平坦的马路、精致的仪器,甚至也不在于学院的建立和科学的发明,而要看这种文明产生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以及他们的语言,这些反映了一个文明的本质、个性和灵魂。因此,辜鸿铭评价一个文明更注重精神性的东西,而不是物质性的东西。

辜鸿铭学贯中西,通晓9种语言,拥有13个博士学位。这些资历使他能深邃了解欧美国文化的本来面目并能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看中国文化。他言辞犀利,辩才无碍,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讲儒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交流,讨论世界文化和时事政治,印度圣雄甘地称他为“最尊贵的中国人”。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凭着他对欧美文化有过数十年的精湛研究,在政美学界享有盛名。当中西方文明发生冲突,几乎所有的中国先进分子都主张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毫无保留地吸收西方文明的时候,这位学贯中西的文化怪杰却站出来捍卫中华传统文化,以一己之力对抗着整个西方殖民主义的话语系统,写出了独属于中国的价值理念。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出版后获得了巨大的反响,以至于他在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内演讲此书时,要收门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辜鸿铭在外国人中的知名度由此可见一斑。

在当今国学重新成为热潮的时候,我们重读辜鸿铭,更应去看一个精通西学的人如何去接受国学,对于唤起我们的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也有着积极的启示。

从文化巨擘眼中重唤民族自信

海南作家韩芍夷用了约三年的时间,首次尝试农村题材,完成了一部写三代文昌女人的小说,取名《伤祭》。小说围绕外婆、母亲、外孙女三代女人来叙述韩家这个华侨之家,采用“现实-历史-现实”的环状结构,并尝试性地应用了本地方言,镶嵌了海南多彩的乡俗文化。

韩芍夷:写《伤祭》是很大的挑战

等,语法也用海南话的语法,增添了本土气息。难道你担心这样会影响非海南籍读者的阅读?

韩芍夷:这是我第一次在小说里用方言。也许这里有一个很深的海南情结。作为一个本土的写作者,写一群土生土长的海南人,就特别渴望海南人的气息是全方位的,海南的地域文化应在书里有所体现。我给这本书的定位是:一本自己讨好自己的书。

海南周刊:这部小说里有你的影子或经历融合在其中吗?

韩芍夷:不那么明确。确切地说,这部小说里有我的思想和情感的表达。

文昌女人写不尽

海南周刊:你想通过这部小说表达或展示什么?

韩芍夷:写这部小说,是想用形象来记忆历史,把逐渐被遗忘的历史保存下来。我写她们对土地的相守与对亲人的守望;写她们的爱与忧伤;写她们随着社会的动荡而起伏跌宕的命运……文昌女人的吃苦耐劳、坚强善良是她们的特质之一。

海南周刊:你也是文昌人,对文昌女人的评价如何?

韩芍夷:我生长在海口,但父母都是文昌人。我对文昌女人的了解是从身边的亲人那了解的。文昌女人因温柔、贤惠、勤劳、隐忍而闻名。在海南,文昌女人,几乎是传统完美女性的代名词,尤其是在以往的岁月里。我曾在《也说文昌女人》的随笔里这样写:女人的温柔、贤慧与勤劳,是美德,女人意志的坚韧、女人心胸的宽阔,更是令人钦佩。但是,由于女人的美德助长了男人的惰性,这便是可恶;由于女人的宽容怂恿了男人的不负责任,这便是罪过。

海南周刊:你喜欢在小说里写女人,是因为自认为更了解女人么?

韩芍夷:我喜欢在小说里写女人,以往的作品大多也是写女人。我把写女人视为创作的母体,是因为我不太了解男人。是否自认更了解女人?不知道。女人的心是一口深井,望不到底。但女人写女人,容易入手,也更贴切。

海南周刊:有将它改成电视剧或电影的打算吗?

韩芍夷:当然有了。只是这不在我,要有人相中。

海南周刊:这部小说获得了“2010-2011海南文学双年奖”,达到你预期的成功吗?你对它还有什么更高的期待?

韩芍夷:那要看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对我而言,多年前,我有写这本书的愿望,现在我把它实现了,我的心愿了了。仅此而已。我对它更高的期待是能改编为电视剧或电影,使它传播的范围更广一些。当然,这也仅仅是一个愿望。



《伤祭》封面 作家出版社出版

作家访谈



作家近照

“多年前,我未曾见面的外婆在新加坡去世,享年105岁。当时我想,一个女人活了一百岁,该有多少故事啊!”作家韩芍夷说,“从那时起,我便有了写一本关于文昌女人的书的愿望。”

于是,她从2007年起,用了约三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部写三代文昌女人的小说,取名《伤祭》。这部小说围绕外婆(林碧玉)、母亲(韩诗美)、晓(外孙女)三代女人来叙述韩家这个华侨之家的故事。外婆是文昌女人的样本,是历史的见证。她是韩家的灵魂,守着家园,生儿育女,侍候公婆,又眺望南洋。母亲不愿嫁到南洋,离家出走,又因家庭关系复杂,被迫与初恋的男人(张北)分手。与父亲林海结婚,婚姻生活却不顺,一直与之过着彼此分居的生活。后来爱上了丁力,却不能与他结合。晓因父母婚姻的不幸,恐惧婚姻,不愿结婚。外婆的去世,改变了她们的想法,她们对以往的生活进行反思。她们在恨与忧伤中挣扎,又在爱和宽恕中走向平和。小说还写了留守新娘琼香和桂芳相同命运不相同的结局,体现她们不同的价值观。小说刻画了这群文昌女人不同的性格特征,对文昌女人的历史和现实进行了艺术性的描绘。

《伤祭》2011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各界的肯定,还获得了“2010-2011海南文学双年奖”一等奖。评委会对这部作品给予较高评价,称《伤祭》不仅题材独特,而且在叙事手法上也颇有用心,全书采用“现实-历史-现实”的环状结构,叙述视角多变,感情充沛,文笔细腻,直指人物内心,故事步步深入,颇有引人之处。其中尝试性地应用了本地方言,并镶嵌了海南多彩的乡俗文化,是海南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可喜收获。

近日,韩芍夷接受了海南周刊的专访。

“一本自己讨好自己的书”

海南周刊:创作的过程顺利吗?

韩芍夷:刚开始时有点难,写了两万字就放下了,放了很久,因为走不进去,毕竟那个年代那些人物离我太远了。后来翻了一些资料,看别人写的一些有关南洋的纪实文章,才接着写,写得很慢,渐渐有了些感觉。真正写进去应该是2008年,2010年5月完成初稿,到出版时改了四稿。

海南周刊:你以前的作品《城市无梦》、《目光里的对峙》、《驿动的年轮》都是写现代城市题材,这次写《伤祭》很不一样,感觉会不会很难?

韩芍夷:第一次写时间跨度这么大的作品,其中大部分时间还在农村,这些都不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当然很不容易。也正因为它与以往的写作不同,对我来说,才具有挑战性。它挑战了我的写作能力,也挑战了我的毅力。

海南周刊:这部小说叙事手法很特别,从外婆去世倒叙,叙事者也经常变换。为什么这样写?

韩芍夷:这部小说的时间跨度较大,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末,其间经历了下南洋、抗战、内战、土改、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这几大特殊的历史时期,正面写没有这么大的笔力,也没必要。从外婆去世倒叙,是避免记流水账,避免在情节上拖泥带水,在整体结构上更紧凑一些。扬长避短嘛。叙事者每章不同,是在这种结构下根据故事的推进来安排的。叙述视角不同,口气不同,是希望人物的特征有所差别。这样的写作技巧是否高超?我不知道。有评论家就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文学作品的结构力就是思想力。我赞同这样的说法。

海南周刊:书里用了很多海南方言词汇,比如咖啡黑(不加牛奶或咖啡伴侣的纯咖啡)、贵器(宝贝)、学古(讲故事)、生牛支(傻)

文/海南日报记者 王亦晴